為士之道

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

【增訂版】

王德權・著

政大出版社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 / 王德權著. –
增訂一版. -- 臺北市：政大出版社, 2019.06
面 ； 公分
ISBN 978-986-97355-7-5（平裝）

1.知識分子 2.唐代

546.1135 108009080

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增訂版）

著　　者｜王德權

發 行 人　郭明政
發 行 所　國立政治大學
出 版 者　政大出版社
執行編輯　林淑禎
地　　址　11605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　　話　886-2-29393091#80626
傳　　真　886-2-29387546
網　　址　http://nccupress.nccu.edu.tw

經　　銷　元照出版公司
地　　址　10047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28號7樓
網　　址　http://www.angle.com.tw
電　　話　886-2-23756688
傳　　真　886-2-23318496
郵撥帳號　19246890
戶　　名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黃旭田律師
電　　話　886-2-23913808

排　　版　弘道實業有限公司
印　　製　敏強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12年9月
增訂一版　2019年6月
定　　價　500元
I S B N　9789869735575
G P N　1010800972

政府出版品展售處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104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 五南文化廣場台中總店：400台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886-4-22260330

尊重著作權・請合法使用
本書採用環保油墨印刷，封面選用環保美術紙

謹將此書獻給

摯愛的妻子惠芬

CONTENTS

許序 i

序論 士人、鄉里與國家——
古代中國國家型態下士人性質的思考 001

一、為何問「鄉里」 002
二、「國家—社會」視野下的鄉里 008
三、「核心—四方」的國家型態 018
四、漢代禮儀法制中的「鄉里」 024
五、「士大夫非天子所命」的讀法 032
六、唐代「個體化」官僚制的誕生 053
七、本書的視角與章節 062

1 無鄉里之選——
唐代士人處境的制度與結構分析 069

一、唐前期的選舉議 070
二、五服之內，政決王朝——劉秩〈舉選議〉分析 076
三、「無鄉里之選」 084
四、士不成士 093
五、結論 107

2 酌古之要，適今之宜——
杜佑與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 109

一、酌古之要，適今之宜——杜佑論「古與今」 111
二、杜佑論兩稅法 117

三、杜佑與中唐士人自省風氣 124
四、「士自身」——官僚個體化處境下士人自省的動向 139
五、結論 147

3 孤寒與子弟——
制度與政治結構層次的探討 151
一、唐史研究的「難解之結」 152
二、關於「孤寒」的幾種解釋 157
三、「孤寒」解 164
四、「孤寒」社會實態的多樣性 177
五、「孤寒」現象的制度與政治結構分析 181
六、「孤寒」與中晚唐政局 190
七、結論 208

4 重構「為士之道」——
柳宗元士人論的考察..... 211
一、柳宗元士人論的諸問題 213
二、天人之分論的醞釀及其體系化 231
三、道在于人 243
四、官者，道之器 258
五、明與志 272
六、結論 279

5 「士人入仕」的再詮釋——
柳宗元〈封建論〉的一個側面 285
一、〈封建論〉要旨 287
二、生民之意 290
三、勢 294
四、理物之士 299
五、結論 308

6 「為政之道」的探求——
從中唐士人的「慚愧」意識談起 313

一、慚愧的對象 316
二、慚愧的理由 320
三、「面向鄉里」的動向 334
四、「為政之道」的探求 343
五、結論 363

7 結論——漂泊的士人 365

一、「內」與「外」——古代中國國家型態及其組織化進程 365
二、「士」與「仕」——古代國家組織化脈絡下的士人入仕 369
三、漂泊的士人——制度與結構變遷下唐代士人的處境 372
四、「士何事」——重構「為士之道」 373
五、「士之職」——「為政之道」的探求 374
六、斷裂與延續——由唐到宋士人群體的動向 375
七、尾聲 383

附錄 古代中國體系的搏成——
關於許倬雲先生「中國體系網絡分析」的討論 387

一、前言 387
二、「中國體系網絡分析」的主旨 389
三、「中國體系網絡分析」的兩個源頭 394
四、關於「中國體系網絡分析」的討論 402
五、結論——兼論漢唐帝國與地域社會 420

徵引書目 431

作者後記 447

再版後記 451

許序

王德權先生這本書是討論中唐時代士人的自覺，他的選題十分睿智：唐代中期的士大夫確實正在進行嚴肅的檢討，那時士大夫界定自己的身分和功能，正是中國社會史上重要的轉折點，對於宋明以後的中國社會精英角色具有不可逆轉的影響。

士的原始身分可能是古代戰鬥部落的戰士，他們並非當時社會的精英，而是社會的骨幹。在西周建立分封制度後，領主手下的戰士們轉化而為貴族階級的基層人員，他們也成為管理封邑的幹部。春秋時代封建制度逐漸崩潰，許多失勢諸侯領下的士，喪失了原有的社會地位而流散在民間，但仍保有一定的文化修養也具備管理者的知識。孔子就是這種失位的士人，許多當時的遊士也都屬孔類的人物。

春秋戰國的數百年間，新興的國家型態逐漸出現，遊士們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見，也參與政治活動。雖然諸子百家各有專長，但互有影響，他們共同形塑的成果是戰國末年那些王權與官僚共構的國家體制。

秦始皇統一中國，其帝國的龐大規模是採納了戰國列強的各種體制。秦的管理人員尤其是地方首長，大概都是由軍官轉任，從睡虎地等處的秦代考古資料看來，這些軍官轉任的地方首長，還具備有遊士們的管理知識。從秦的基層管理人員的墓葬中，常有一些《為吏之道》之類的讀本和手冊。因此，在秦帝國的國家體制內，先秦的遊士並不具有精英的地位，反而是秦始皇坑儒的對象。

漢承秦制，早期的政府人員幾乎都是功臣集團及其後代，「士」的地位僅在權力的邊緣而已，或為文學侍從，或為謀士說客，並未構成社會群體。

賢士大夫的名稱，竟指閭里豪強。

察舉制度建立後，地方領袖才經由察舉的管道，進入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這些人既代表地方層次的利益，又在自己的官位上代表了政權的權威，於是國家和社會，由此龐大而堅實的士大夫群體結合在一起。漢帝國的基礎深植於地方鄉里，而士大夫的意識形態則是儒家教育給予的倫理觀念：孝悌力田、孝廉方正。他們的任務是為國家建立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也儘量維護平民百姓的安全與生活。西漢一代多循吏、良相，高談哲理的思想家反不多見。西漢的士，志不在為天地立心，而是為生民立命，其終極目標是在人間開創太平。東漢儒者的整理經典，才開始了為往聖繼絕學的功夫和自我期許。

東漢的士大夫，逐漸發展為大族，盤踞地方，壟斷察舉的上升途徑。在中央政府，大族出身的官員，面對代表王權的外戚和宦官，形成三角關係。國家權威因為政局多變而難以施展，東漢終於分裂。接著是外族紛紛入侵，北方淪為胡人政權，漢人大族聚族結為塢堡，與胡人政權周旋。南方則是南渡大族與南方地方大族，共享中國東南。無論南北，都是階級社會，大族士大夫儼然是貴族，小民百姓則是部曲附從。這些貴族，只是享受富貴，不再是社會精英。有志之士，頗多反省，尋求自己安身立命之所。當時佛、道二家，即成為南北士人歸依的天地。當時風氣，高明之士，大致都是明哲保身，以個人思想的自由作為歸宿。除了少數例外，個人心靈的自由代替了社會責任。

隋唐統一中國，基本上是武人的政權，南北士大夫都必須屈從於強大的王權。政治權力，經由均田制，直接掌握生產資源；大族還在，可是除了高貴的社會地位，已不能代表社會力，制衡國家的權力。初唐安定，百姓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號為盛世。安史之亂，兵連禍結，中國北方成為胡人的戰場，百年不得太平。由盛而衰，刺激之深，逼得中唐的有志之士，不得不作深切的反省，這才有本文研究的主題湧現。

王德權先生指出韓愈和柳宗元思想的不同，乃是十分敏銳的觀察。韓愈重新討論終極關懷，表彰「道」的意義，也指出天人之間的呼應，肯定道德修養的根本價值，甚至以為修德就可以防止天災人禍，他在潮州的驅鱷文，

就是這一觀念的實踐。韓愈的「原道」，於是開啟了後世「道」、「理」的形上學。而柳宗元和劉禹錫，則以淑世的情懷，解釋人事，也主張盡人力，以解決人間的困難和災害。他們的差異，分別代表了「內聖」和「外王」的兩種自我期許。回顧歷史，孟子和荀子的差異，也幾乎是如此。

展望後世，宋儒幾乎全都選擇了韓愈的路線。從此以下，中國的文化精英，大致只有「尊德性」和「道問學」二途。具有淑世抱負的學者，在宋代，可能只有范仲淹、王安石、辛棄疾、陳亮，寥寥可數的幾位而已。下及明清，讀書人中，或是科舉的祿蠹，或是冬烘。學者只注重德性與問學二科，無非說仁道義，平時不會辦事，不會解決問題，大難來時，唯有「一死報君王」。最後一個代表人物，乃是 19 世紀的葉名琛。孔門弟子，子路、子貢，有經國濟世的才具和抱負；子宓也有治理一個地區的能力。明清之世，大多數讀書人缺乏淑世濟民的能力和抱負，雖然有些地方的縉紳具有代表地方社會力的地位。但是王權高張，士大夫又拘泥於君臣的倫理，這一社會力遂不足以約束政治權力了。他們更不能擔起代表社會力量的重任，以抗衡國家政權的巨大力量。

撫今思昔，今日的士大夫又往往自限於專業，罕見有廣闊的胸襟與超越細節的眼光。才難之嘆，於今為甚。王德權先生的大作，不僅是一篇細緻的研究，也是引人深思的提示。

許倬雲

序於匹城

2012 年 5 月 27 日

作者後記

取下書架上泛黃的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書末寫著：「民國 71 年 10 月 26 日讀畢。」那是筆者剛升上大二的時候。如今，再次翻閱此書，思緒飄回到求學以來的點點滴滴。自筆者進入歷史系就讀，轉眼已歷 30 寒暑，循著與賓四先生不同的道路，摸索著認識中國的可能性，赫然發現筆者此刻站立的位置，竟是賓四先生當年曾經駐足之地，不禁興起驀然回首的感慨。

還記得 20 年前筆者初任教職，講授中國政治制度史，知而不識的窘迫，至今依然歷歷在目。課堂上，口若懸河講述某個主題（制度、事件或人物），或許不是件困難的事。但將不同的主題納入一個貫時性的制度史敘事裡陳述，當時的筆者顯然力有未逮，遑論將此貫時性的制度史敘事，鑲嵌在古代中國特性的脈絡中，賦予講述的現象契合中國史的整體解釋。如何在制度變遷與制度關聯方面，闡釋不同制度形成的背景及其演變趨勢，如何釐清並建構符合古代中國史特質的制度史敘事，心頭的壓力始終揮之不去，尸素之愧始終繚繞於心。

甫任教職之初，毛漢光先生建議筆者開授通史或理論課程，否則將無法超越斷代史研究過度專業化的知識侷限。當時為了準備這些課程，沈重的教學負擔幾乎讓人無法喘息。於今思之，這段痛苦的「在職訓練」，拓展了筆者反思古代中國的知識基礎。通史或專史等課程兼具縱深與廣度，亟需整合大量知識，當筆者嘗試這麼做的時候，一些原本看似合理的論點，頓時顯得模糊難辨。為了化解心頭日漸滋生的困惑，理清當時已嫌混亂的思緒，筆者不得不暫時駐足，回過頭來重新摸索認識中國的道路。從制度史到社會經濟結構，進而納入空間脈絡的思考，最後又回到政治史領域。近十年的摸索讓

筆者的思慮顯得龐雜，有待梳理。基於清理自身思維的目的，1999 年，筆者撰成評論許倬雲先生古代中國體系網絡分析的初稿。在這篇 4 年後發表的論文〈古代中國體系的摶成——關於許倬雲先生「中國體系網絡分析」的討論〉裡，初步形成對古代中國「核心—四方」國家型態的假說，也是此後筆者重新詮釋中國史的問題意識之起點。

論者或以為前文意在摭引前賢，卻未能理解此文的出發點是筆者探索認識中國的路途上，嘗試在我們自身的學術傳統裡，尋找一個可資依循的脈絡。1980 年代筆者求學之始，正是許先生致力推動社會經濟史研究之時，引領著筆者這個世代認識中國。這篇論文的撰寫，促使筆者開始注意到從戰前到戰後學術世代間的知識傳承，從侯外廬、陳寅恪、錢穆到張光直、許倬雲、毛漢光，都曾在空間脈絡下提出迄今仍深具效力的中國史解釋，這個解釋傳統，將是我們與日、美等域外漢學界之中國史詮釋展開對話時的有力支柱。戰前學者多擁有深厚的傳統學養，他們並非憑空立說，其觀點更可在荀子、賈誼和柳宗元的議論裡獲得共鳴。在 20 世紀上半葉那個艱困的年代裡，他們以開放的心靈接受異見，孕育出近百年學術與思想的黃金年代。[1] 回顧百年來中國史研究的歷程，在認識中國這個目標上，戰前學者勾勒出的中國圖像，迄今仍深深啟迪後人。從戰前到戰後的學者們提出的論點，宛如漆黑的夜空裡點綴的幾許星芒，共同構築了一個迄今仍深具說服力、解釋中國史的傳統。

此文刊登後，許先生一秉獎勵後進之誠，對筆者的評論不僅不以為意，且在 2003 年春返台之際，與筆者長談近三個小時。談話中，許先生深入闡述他的治史理念以及對中國史的看法，使筆者受益匪淺。數年後的今天，許先生更應允為本書撰寫序文，獎掖後學的拳拳之心，筆者感念在心。

毛漢光先生承襲許倬雲先生「核心區」理論，重新詮釋寅恪關隴集團說，提出「核心集團與核心區」理論，啟發筆者展開古代中國「核心—四方」國家型態的討論。這個論點固不止將時代往上拓展至南北朝、向下延伸

1　被後人視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錢穆，在《國史大綱》裡，援用馬克思主義史家侯外廬的武裝殖民說，解釋西周封建過程，即其一例。

至五代而已，其間更隱含著對古代中國國家形成模式的可能解釋。筆者注意到這個空間脈絡下的論點，隱然與戰前侯外廬、錢穆之中國史論述遙相呼應，也與戰後張光直、許倬雲的中國史詮釋相互發明。毛先生的觀點，為當時困於摸索的筆者打開了一扇窗，得以睹見窗外的世界。

初步建立空間脈絡下中國的假說後，筆者回到睽違已久的唐史研究，基於自身的制度與政治史興趣，嘗試從「政治體系下的行動者」的角度，探討唐代士人課題。2003 年 9 月，在武漢大學舉行的一場國際會議上，筆者宣讀〈唐史研究的難解之結——牛李黨爭課題的再檢討〉，這篇粗疏的文章提出的問題成為本書的起點。這篇論文並未在實證或史料層面提出什麼新見解，而是以黨爭課題的研究為例，揭示戰前到戰後學術世代間的斷層。文中指出：後來的學者圍繞著寅恪唐代政治黨派的三個解釋，雖歷經半個多世紀的往復辯難，研究成果已積累至難以掌握的程度，讀者卻只能霧裡看花，莫衷一是。在沒有新材料問世的前提下，一再重覆且無共識的討論，固然表現出我們對這個課題的興趣，卻顯示我們正面臨方法、理論與視野的重大分歧。爭論的關鍵在寅恪「禮法、門風」的解釋未受重視，甚至視其為主觀唯心的道德囈語。但翻開史冊，徵諸唐人議論，其間呈現的道德困境昭然可見，寅恪側重道德層面的提論，不是出於他主觀的想像，而是如實反映了唐代士人的困境。寅恪禮法門風之說提供我們認識唐代士人處境的重要線索。寅恪論點未受到後來學者重視，顯示戰前與戰後世代間的斷層，一道由冷戰意識型態、史學專業化共同構築而成的巨大鴻溝。

反觀戰前學術世代，寅恪側重道德的觀點並非特例。向來與寅恪針鋒相對的岑仲勉，也是從道德立場肯定李德裕「持正無黨」。稍早以前，受教於寅恪的楊聯陞，也以「不甚富而有知」、「富而甚無知」，區別漢末清流與濁流。錢穆也強調士人的道德與外部世界之互動，表示：要探討古代士人，宜認識其道德與正義感，但不能「太往內心裡去」，應著重在士人「外面的政治社會經濟因素」。[2] 戰前學者顯然不是唯心、抽象看待士人的道德，而是將士人的道德置於和外部世界互動的脈絡下理解其意義。若將戰前學者注重

2　錢穆，〈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頁 249-251。

士人道德的共識，視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主觀陳詞，忽略其間潛藏著對古代士人處境的相對客觀之陳述，我們將錯失有益的教示。

研究中國史，不免要問道：「中國之所以成其為中國，其理安在？」即使到了今天，這個老問題仍深具意義，葛兆光近著《宅茲中國》也是為此而作。無可諱言地，在史學現代化的趨勢下，筆者這個世代多已不具備整體論述中國史的能力。戰後中國史研究，專業化的進展有目共睹，多樣化的研究題材也令讀者目不暇給，新課題不斷被提到學者的研究日程表上。學者不懈地努力，在現象面的剖析上多所創獲，但當我們嘗試在為這些現象提出可資理解、尤其是契合中國史進程的解釋時，能力卻顯得薄弱。南宋李延平曾如此評論其時代的學風：「前輩議論麤而大，今日議論細而小。」[3] 這個評論或許也適用在我們這個時代。史學專業化的確讓我們習得更精緻的技藝，探索前人未知的領域，但在漸入細微處失其大體。套用唐人的話，這是一個「文勝質」的時代。

或許，本書的寫作方式與時下專業化、重實證的學風不盡相合，但筆者篤信章學誠所言，歷史知識的性質與價值在「不離事而言理」，「事」是認識歷史的手段與媒介，「理」才是歷史作為一門知識而存在的目的。嘗試提出契合中國史特質的歷史解釋，是筆者撰寫此書的初衷，至於功過毀譽，就讓讀者自行判斷吧！駐足回首這步履蹣跚的來時路，此刻筆者心中沒有一丁點創獲的喜悅，這本即將刊行的書，就權充筆者在認識中國的路途上寫下的旅程日記吧！

3　轉引自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頁 5。

再版後記

出版社來信告知《為士之道》即將售罄，亟須再版。於是利用寒假期間，修訂初版誤植與疏漏之處。為了讓讀者理解本書的思路，建議出版社以增訂再版的方式，收入 2003 年筆者發表的〈古代中國體系的摶成〉，作為附錄。

筆者甫任教職時，面臨上課時無以自圓其說的窘境，於是嘗試清理混亂的思緒，建立認識中國史進程的宏觀架構，〈古代中國體系的摶成〉就是這個「脫困」過程提出的構想。文中強調古代中國若能視為一個「體系」，摶成此體系的動力不是來自市場，而是國家。循著此文的思路，筆者從國家整合社會的國制建構，詮析古代中國國家型態演變與國制組織化進程，提出「由制度與政治結構摶成的政治體系」這個概念，作為觀察古代中國史進程的框架。在「政治體系下的行動者」的架構下，探討隋唐國制變動下士人的處境，《為士之道》就是這個思路下的成果。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這個既古老、又深具現實意義的課題，是筆者省思中國史的起點。期盼本書提出的觀點，有助於讀者在貼近中國史的脈絡下，理解古代中國的歷史進程。